

(接上期)

除了绘画成就,更难能可贵的,我认为还是潘素对张伯驹的爱情,真正做到了与张伯驹风雨同舟、患难与共。很多人对于潘素的叙述往往止步于她的婚恋传奇,对她的一生则少叙述,而我认为,作为一个女性,她在结婚之后漫长岁月里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品格,才是更为可贵的,因此,我在这里多讲一些。

对于潘素深有研究的任凤霞女士在《慧心百年 素韵流芳》一文中说:“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,潘素只是幸运,才有了近乎完美的婚姻、事业和家庭,只是选对了男人,生命才绽放出了精彩和绚丽……潘素一生付出了远超寻常女子的努力和艰辛,却鲜为人知。她的情怀、品格似乎在张伯驹盛誉掩盖下很少有人去挖掘和描述。”

这段话说得很深刻,张伯驹和潘素的结合固然传奇,但最为高尚和感人的还是他们那漫长的婚后岁月。

潘素第一次面临巨大考验是1941年张伯驹被匪徒绑架、命悬虎口之时。

1941年6月,张伯驹在上海遭遇绑架,一时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,这是一起典型的打击报复,勾结汪伪特务、匪徒掳人勒赎的可恶行为。

张伯驹在上海没有私人住宅,其时正住在陕西北路一个叫牛敬亭的河南老乡的宅院中。一天张伯驹去银行上班,刚走到弄堂口,被一伙人绑架而去。当时邻居看见张伯驹被抓,立即告诉潘素。潘素不知所措,跑去找孙曜东,展开了营救活动。

时年潘素27岁,心思单纯,毫无社会生活经验,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场横祸,丈夫生死难料,其所承担的巨大压力以及面对的环境之复杂是不难想象的。她终日坐卧不安,提心吊胆,每至夜深,恶梦不断。一位年轻妇女就这样抛头露面,探听消息,打通关系,筹措款项,且营救过程复杂多变,持续了8个月,她要精心珍藏、保护张伯驹视若生命、不许变卖的书画珍品,还要面对社会上卑劣之徒的不良居心,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

经过她的周旋和斗争,张伯驹终于脱离虎口,朋友们都称赞潘素夫人侠肝义胆、忠贞贤良。老画家陶心如为此泼墨作画,赞誉潘素。古人云“从行赴难有贤妻”,潘素做到了。

张伯驹夫妇经历的磨难和考验还有很多,这一讲就先讲这些,后面还要讲到。我想在这里补充的一点就是关于张伯驹与潘素恋爱的经过,还有一种说法,即上世纪80年代初,曾任项城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刘运星,于2002年撰文《八宝山向张伯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回忆》一文。他说,张伯驹先生逝世后,张伯驹夫人潘素和一家人及亲戚们正在料理张伯驹的后事,自己也在场。在谈到张伯驹一生大事时,潘素曾抹去脸上热泪,若有所思地说起她和张伯驹相识相恋的过程。她说:“我父亲在旧社会吃喝嫖赌都干,认识人很多,经人介绍也认识了张伯驹。初开始张伯驹每次到我家总是谈些诗呀词呀,我心想这个人怎么总是谈这些呢。稍后我又得知张伯驹是个富家公子,又是才子,他却与其他公子少爷不一样,不抽大烟,不喝酒,不嫖女人,专心研究诗词做学问,品德高尚,世上少见。慢慢地,我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,后来我们就订了婚。”

这一段潘素的回忆,否定了张伯驹在玩乐场所一见潘素惊为天人的说法。那么,张伯驹与潘素的相识传奇,确实是传奇而已,民间的想象力真是可以把传奇编织得天衣无缝啊!

近日,张伯驹先生的外孙楼开肇发表了《我外公外婆的倾国之恋》一文,其中叙述的情况基本上与刘运星的叙述一致,是可信的。楼开肇说:

我的外婆原名潘白琴,1915年出生在苏州。她的父亲是潘智合,母亲是沈桂香……我外婆十几岁的时候,亲生母亲去世了。父亲娶了后妈,后妈觉得白琴不能每天在家里闲着,无所事事,要挣点钱,就像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一样。因为她从小接受艺术熏陶,学习书画,也会弹琵琶,正好有一技之长,就到上海的书场,就是表演弹唱的地方,在那里谋生。

现在外面传言的,说她因为母亲去世,后妈把她卖到青楼,完全是按照上世纪9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演绎的情节编造的。后来越演越烈,大家你骗我,我抄你……

但不是那么回事。

我的外公张伯驹,有些人想象他的夜生活,要吃花酒、应酬,说他是在风流场所遇到我外婆的,后面还演绎成张伯驹和一个国民党军官争女人。这都是传言,与事实越来越偏离。其实我外公和外婆的相识,在我外公的日记里面有记载,他们是通过父辈的一个世交,叫孙履安,通过他的介绍,两个人相识,最后在苏州完婚的。

楼开肇这些话,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可信的、合情的,至于孙履安,笔者认为,和刘运星文章中所说的“经人介绍”的这个人可能就是同一人。

但不管怎样,张伯驹和潘素结婚了,那些传奇都不重要了。

第三章 词才直似李后主(一)



张伯驹十五讲

作者 张恩岭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

这一章,才接触到张伯驹一生最主要、最突出、最卓越的文化艺术成就——词作。

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,津津乐道的大都还是他的人生传奇、收藏传奇,认为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收藏与捐献,而对他一生词作的艺术成就及其价值和地位,能够深刻理解的人恐怕就不太多了。

其实,张伯驹一生最看重的,也是自己的词,他曾郑重地说过:“文物,有钱则可到手,若少眼力,可请人帮忙,而诗,完全要靠自己。”

张伯驹一生实质上就是一个词人,可以说词作已成了张伯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也可以说张伯驹的文化底蕴主要体现在词作成就上。如果离开了文物收藏,张伯驹仍不愧为一个文化大家和艺术天才,而如果离开了词作,张伯驹文化大家的形象可能就要打些折扣了。

天赋词才

张伯驹去世后的1985年,由中华书局出版了《张伯驹词集》,编选了张伯驹一生词作数千首中的907首,大体反映了张伯驹一生词作的概貌。如果从词集中第一首词的写作时间1927年算起,至1982年,写作时间长达55年。其中1955年至1961年无词作收入,1966年至1969年无词作收入。

一般介绍张伯驹词作概况的学人总是说张伯驹自30岁始为词。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。词集中第一首词是30岁时写的,但不能说他30岁前没有填过词,如果没有填过词,那么,一填词就能那么成熟、那么优美吗?这是不可能的,他必定有一个学习写作的过程。

从张伯驹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已可看出,张伯驹天资聪颖,9岁已能作诗,且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,不用说必然少不了唐诗宋词,模仿而填词,就是自然的了。从他后来撰写的《丛碧词话》可以看出,他从少年时代起,就开始着力欣赏和研究唐诗宋词了,而且其研究相当深入,对诸多词人的词风以及酌句炼字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而且在行文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对一些词人喜好、赞美的情感,例如他对李煜、冯延巳、晏殊、欧阳修等人的小令的喜爱,对擅写长调者姜夔、周邦彦、吴文英等人的推崇。他对这些词人的作品不但喜欢,而且下功夫进行

了模拟创作,以求自己在词作艺术上的进步,这一点,从他《丛碧词》中的诸多依韵之作就可以看出来。这些词作集中,鲜明地展现了他少年时词作的功力,也展现了他的少年才华和刻苦学习的程度。

张伯驹早期的词,多为婉约词。他首先从学习婉约词的小令写法入手,尽量体现小令的精致典雅、工巧流丽的风格,并重视音律谐婉,语言圆润,清新绮丽,以避浅显直白之弊。

对于唐五代词人,他很喜欢温庭筠、冯延巳、李煜、韦庄等人的词,他认为温词大多浓丽绵密,韦词则倾向清丽疏朗,而冯延巳的词语言清丽、委婉情深,与温庭筠、韦庄恰恰分鼎三足。

对于北宋词人,张伯驹在学习小令的过程中,着意模仿的主要是欧阳修和晏几道。欧阳修反对绮靡浮华的文风,提倡简洁平易、委婉自然的文风,他的词作文笔清婉疏隽,情韵淡雅深挚。他有一首词《蝶恋花》:“庭院深深深几许,杨柳堆烟,帘幕无重数。玉勒雕鞍游冶处,楼高不见章台路。雨横风狂三月暮,门掩黄昏,无计留春住。泪眼问花花不语,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这首词写景状物,疏浚委曲,虚实相融,辞意深婉,尤其对少妇心理刻画写意传神。

张伯驹反复品味了这首词,也作了一首《蝶恋花》:

深掩云屏山六扇,对语东风,依旧双双燕。小院酒阑人又散,斜阳犹恋残花面。

流水一分春一半,有限年华,却是愁无限。禁得日来情缱绻,任教醉也凭谁劝。

这首词也是写暮春黄昏之景的,欧阳修的词写重门将黄昏景色掩闭,也无法留住春意,张伯驹也说“小院酒阑人又散,斜阳犹恋残花面”,其情味何其相似。而末句“任教醉也凭谁劝”是从宋末词人黄公绍“花无人戴,酒无人劝,醉也无人管”之名句化出的。由此可见,张伯驹对宋词熟悉的程度,以及领会其含义而又能灵活巧妙地为我所用、化出新意的才华。张伯驹的这首词曾被行家评为“清妙自然”“可乱六一”。

张伯驹也很喜欢北宋词人晏几道。晏几道,是晏殊的幼子,号小山。他生于显贵之家,却不愿攀附权贵,一生浮沉词酒,落拓不遇。其词多写人生失意之感与男女悲欢离合之情怀,以小令人胜,工于言情,语言清新、缠绵、凄丽。他有一首词《思远人》:“红叶黄花秋意晚,千里念行客。飞云过尽,归鸿无信,何处寄书得?泪弹不尽临窗滴,就砚旋研墨。渐写到别来,此情深处,红笺为无色。”

这首词中词人所怀念的“行客”,是两位歌女。晏殊去世后,晏家家道中落,晏几道也从雕梁画栋的楼头,跌落到人情冷暖的世俗。两位歌女自主人败落后,如飞云归鸿杳无踪迹。全词借一系列景、物感兴生情,极婉转,极激切;辞浅情深,平淡含蓄,将词人痴心痴事、痴情痴恋写得深婉动人。

张伯驹对这首词,也有一首和词:

花落絮飞春事了,千里更为客。空来鸿雁,不捎书信,消息怎寻得?

悲时血向心房滴,泪眼渍如墨。待望到尽头,绿侵红惨,斜阳黯无色。

这首词既用晏几道词原韵原字,且先后次序都相同。由此可见张伯驹仿作北宋词人的词,功夫下得很深,这首词也酷似晏几道词的词情和词风。

(未完待续)